

doi: 10.7621/cjarrp.1005-9121.20190920

·三农问题·

西北边疆民族地区农业发展与农民收入的时空耦合特征研究^{*}

——以新疆南疆为例

赵向豪^{1*}, 陈 彤², 卢冰冰¹

(1. 新疆农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乌鲁木齐 830052; 2. 新疆农业科学院, 乌鲁木齐 830091)

摘要 [目的] 农业发展是实现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条件, 农民增收可以有效促进区域农业发展, 揭示两者之间的作用规律为实现区域农业和农村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方法] 文章研究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1996—2015年南疆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之间的互动关系及耦合协调程度。[结果] (1) 在时间演化上, 南疆农民收入增长长期滞后于农业发展, 两者耦合度一直处于拮抗状态; (2) 两者耦合协调关系明显改观, 由“九五”期初的中度失调阶段发展为“十二五”期末的中级协调阶段, 总体上经历了“波动上升—缓慢上升—快速上升”的过程; (3) 从空间分异角度来看, 由于产业同质性逐渐增强, 各地州耦合度变化趋同。[结论] 南疆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之间相互带动作用不够明显、发展不够平衡。因此, 通过加强新型职业农民能力建设和推进农业产业差异化与品质化布局来实现南疆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之间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 农业发展 农民收入 时空耦合 西北边疆民族地区 南疆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21[2019]09176-08

0 引言

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农业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始终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 也是政策制定者的工作重点和理论研究者的关注焦点。“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 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疆、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实现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南疆位于我国西北内陆边陲, 生态环境脆弱, 经济整体发展水平低, 农业生产条件落后, 农民生活水平较低。特别是, 作为我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之一的南疆4地州, 贫困面积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贫困多元化, 是目前全区扶贫开发的主战场, 面临着艰巨的脱贫攻坚任务。特色农业作为南疆的优质资源禀赋, 是南疆农村人口收入的重要来源。推进南疆4地州特色农业发展是提升深度贫困地区内生性发展能力的重要举措。因此, 在乡村振兴战略支撑下, 以《自治区特色产业带动脱贫攻坚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与《南疆四地州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十三五”实施规划》为契机, 深入实践新发展理念, 研究南疆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之间的耦合关系, 在新时代条件下无论对宏观层面西北边疆地区农业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还是对微观层面有效实现贫困农民增收和脱贫致富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不同的农业发展阶段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农业发展是以

收稿日期: 2018-04-03

作者简介: 赵向豪(1986—), 男, 河南漯河人, 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Email: 709007878@qq.com

*资助项目: 新疆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农业扶持政策对农户优质农产品生产行为影响研究——基于安全农业视角”(XJGRI2017059);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部发展研究院定向委托项目“发展南疆现代农业的能力建设对策”(2016XBYD006); 201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专家顾问团决策研究与咨询项目“南疆喀什和田特色产业发展专题调研”(20170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疆南疆三地州农村生态贫困与治理研究”(16BMZ123)

牺牲农民利益为前提，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产品和工业产成品价格“剪刀差”的存在导致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之间在一定程度上脱钩与失调^[1]。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劳动力加速向非农产业流动及农村劳动力红利逐渐消失，已成为中国农业发展中不争的事实。而社会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的缺失，导致农民收入水平虽有提升，但农民依旧“离土不离乡”，农地细碎化，资本和技术生产要素投入不足，进而抑制农业发展。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在新发展理念引导下，农业发展目标发生显著变化，逐步由高产向高效过渡，以质量为导向的增收效应显然优于以数量为导向的增收效应。农业转型发展可以有效促进农民收入水平提高，调整与优化生产结构，加快提升农业生产规模化和专业化水平。这种发展路径能够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发展机制，进一步推进农业发展，进而实现农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的协调与双赢。学界对于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两大系统关系的研究也涌现出一批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业发展系统对农民收入系统的单向影响，主要表现为农业结构优化、农业产业化、农业固定投资与FDI、农业保险发展、农业发展方式及农业机械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采用的研究方法涉及生产函数模型、面板数据模型、动态面板系统GMM模型、DEA-Tobit、双重差分等^[2-8]；二是农业发展系统与农民收入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主要表现为农业科技进步、区域农业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相关研究方法涉及VAR模型、耦合协调模型、莫兰指数等^[9-10]。

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均表明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然而，在实现新疆民生持续改善的大背景下，南疆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之间存在什么样的耦合特征值得关注。因此，文章利用耦合协调模型^[11-13]，探析南疆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之间耦合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揭示农业发展系统和农民收入系统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性及其时空分异特征，为西北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区域经济和农民收入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深入分析“九五”至“十二五”时期南疆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之间的耦合机理，厘清两者之间的内在规律，找出调和双方耦合协调关系的创新路径，对“十三五”时期西北边疆民族地区农业发展和集中连片特困区农民脱贫致富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南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位于新疆天山山脉以南，环抱塔里木盆地，包括巴州、阿克苏、克州、喀什、和田。2015年，南疆总人口为1134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占85%，农业人口占76%；农林牧渔生产总值占南疆地区生产总值的41%。可以看出，农业依旧是南疆农民赖以生存的主要产业。特别是，南疆作为全疆的棉花适宜产区和优质产区，分布着我国优先建设的优质陆地棉区、长绒棉区和中长绒棉区，2015年棉花播种面积占全区的54.13%。可见，棉花在南疆农业生产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并成为农民重要的收入来源。其中，南疆4地州位于新疆西南部，兼具集中连片特困区、生态敏感脆弱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边境地区等多重特征；区域内耕地面积少，城镇化水平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疆平均水平，所辖33个县（市）中，有21个县（市）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市）。

1.2 研究方法

1.2.1 耦合度

该文采用耦合度研究农业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的耦合关系，用人均农林牧渔产值来表征农业发展系统(μ_1)，用农民人均纯收入来表征农民收入系统(μ_2)。耦合度的计算公式为：

$$C = \sqrt{\mu_1 \cdot \mu_2} / (\mu_1 + \mu_2) \quad (1)$$

式(1)中， C 为耦合度，介于[0, 1]， μ_1 、 μ_2 分别为农业发展系统、农民收入系统的评价指数。当 $C=0$ 时，表明两个系统之间无关或关联性极小，系统向无序状态发展，两个系统之间不存在耦合关系；当 $C=1$ 时，表明两者耦合度最大，两者联系越紧密，相互影响越大，制约性也就越强，表明两系统之间达到良性耦合且趋向新的有序结构发展，即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之间实现良性耦合。根据耦合度的变

化特征，借鉴相关研究^[14]，将耦合度值划分为 4 个区间^①，每个区间代表相应的耦合状态。多个耦合类型形成连续有序的阶梯，能够更为直观有效地观察到农业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的耦合程度。

1.2.2 耦合协调度

在耦合度基础上，引入耦合协调度以分析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两个系统交互耦合的协调程度，以反映不同时点、不同区域“农业发展—农民收入”系统间整体协调性的强弱。耦合协调度的计算公式为：

$$\begin{cases} D = \sqrt{C \cdot T} \\ T = \alpha\mu_1 + \beta\mu_2 \end{cases} \quad (2)$$

式(2)中， D 为两个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 C 为耦合度。 T 表示两者的综合协调指数，体现两者在某种耦合水平上的协调。 α 、 β 为待定系数，两者的取值通常取决于各自在系统中的重要程度。研究发现，在分析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南疆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之间的耦合关系时，两者居于同等地位，所以 α 、 β 均为 0.5。同时采用中值分段法，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 10 个区间^②。

1.2.3 同步发展指数

构建同步发展指数，反映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之间的同步协调情况。同步发展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mu = \mu_1 - \mu_2 \quad (3)$$

式(3)中， μ 为同步发展指数。 $\mu = 0$ 表示两者完全同步， $-0.1 \leq \mu \leq 0.1$ 表示两者基本同步， $\mu > 0.1$ 或 $\mu < -0.1$ 表示两者发生偏离（其中， $\mu > 0.1$ 表示后者滞后发展， $\mu < -0.1$ 表示前者滞后发展）。

1.3 分析单元与数据来源

以新疆南疆作为该研究的分析单元。鉴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特殊的建制，其未列入该研究的空间范畴。以“九五”至“十二五”时期的 1996—2015 年作为该研究的时间区间。因此，基于 1996—2015 年南疆 5 地州的面板数据，开展其农业发展与农民收入的时空耦合协调关系研究。为保证数据的真实性、连续性与一致性，南疆各地州的农林牧渔产值、农林牧渔从业人员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等数据均来源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官方网站。同时，为了消除指标间的量纲和量级的影响，对数据进行标准化与归一化处理。需要说明的是，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简称巴州，阿克苏地区简称阿克苏，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简称克州，喀什地区简称喀什，和田地区简称和田。

2 结果与分析

2.1 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评价指数时空特征

由图 1 可见，南疆农业发展评价指数整体上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农民收入评价指数整体上呈现出渐进式上升趋势。具体分析可发现，“九五”至“十五”期间 μ_1 和 μ_2 同步增长，“九五”期初至“十五”期末两者差距逐步缩小，之后又不断拉大。“十一五”至“十二五”期间，农业发展评价指数曲线呈现出先“快速增长”后“缓慢增长”的两阶段特征。与之相反，农民收入评价指数曲线呈现出先“平稳缓慢增长”后“快速递进增长”的特征。究其原因发现，“九五”和“十五”期间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缺乏一定的专项政策支持，“十一五”以后提出大力发展战略特色林果业，使得南疆 5 地州农业总体上有了一定发展，但由于交通条件限制、林果储藏设施缺乏、加工技术更新缓慢以及后期的无序扩张，使得林农、果农的收入并没有得到大幅提升。2004 年以后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业的聚焦、“对口援疆”政策的实施全方位加快了农民收入的增长步伐，使得农业发展与农民收入的差距逐步缩小。对于 2020 年

^① 耦合度 (C) 的判别标准：低水平耦合阶段 ($0 < C \leq 0.3$)、拮抗阶段 ($0.3 < C \leq 0.5$)、磨合阶段 ($0.5 < C \leq 0.8$)、高水平耦合阶段 ($0.8 < C \leq 1$)

^② 10 个耦合协调等级：极度失调 (0 ~ 0.09)、严重失调 (0.10 ~ 0.19)、中度失调 (0.20 ~ 0.29)、轻度失调 (0.30 ~ 0.39)、频临失调 (0.40 ~ 0.49)、勉强协调 (0.50 ~ 0.59)、初级协调 (0.60 ~ 0.69)、中级协调 (0.70 ~ 0.79)、良好协调 (0.80 ~ 0.89)、优质协调 (0.90 ~ 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针对南疆4地州集中连片特困区的扶贫举措从未停止过,且扶贫模式日益多元化,旅游扶贫、光伏扶贫、生态扶贫和农牧业产业扶贫等多措并举、互为支撑的扶贫工程全面推进,使贫困农民减贫脱贫效果较为显著^[15]。南疆是全疆乃至全国重要的棉花主产区和棉花优势产区,2011—2013年实施的棉花临时收储政策刺激了南疆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规模的迅速扩张以及棉农收入的增长^[16]。但是在2014年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实施以来,棉花生产格局逐步优化,规模和产量逐步缩减,农民收入增长趋缓。

另外,通过对两大系统评价值 μ_1 、 μ_2 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图1),1996—2015年 $\mu_1 \geq \mu_2$ 。其中,1999—2003年与2014—2015年的 $0 \leq \mu < 0.1$,表明农业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属于同步发展状态;其他13个年份 $\mu > 0.1$,表明农民收入增长明显滞后于农业发展,农业发展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大于农民收入增长对农业发展的贡献。以上表明,1996—2015年的大多数年份,特别是前3年和中后期的2004—2013年南疆农民收入增长明显滞后于农业发展,但在2013年之后有所改观。因此,南疆的农业发展水平与农民收入增长的需求普遍不匹配,两者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牵制了对方的发展。

2.2 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的时序演变特征

由图2可知,1996—2015年南疆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之间的耦合度不容乐观。在此期间,耦合度总体上保持在0.49左右浮动,20年耦合度变化特征不是十分明显,两者关系一直处于拮抗阶段。1996—2000年耦合度上升趋势较其他时期更明显,2004—2010年呈现出略微下降的趋势,且2009年下降至0.4836,达到了2000年以来的最低值,表明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相对以前年度耦合程度有所下降,关联性减弱,脱钩趋势增强。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之间的互作用不够明显,相比以前年度存在更加明显的滞后性和发展不平衡性。2009年以后耦合度不断上升的原因主要在于2010年以后两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召开,第一次会议强调通过财政和援疆资金改善农民生活条件;第二次会议突出就业第一位,坚持教育优先、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更加注重民生和精准扶贫的必然结果就是农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但从整体耦合度的评价结果来看,南疆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之间的耦合度与时间的相关性不显著,说明南疆农业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耦合的重点和强度存在时间差异性。

耦合协调度模型旨在分析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两大系统耦合的协调程度。1996—2015年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度处于0.2740~0.7071,总体上呈现出逐步上升趋势,其协调等级也从最初的中度失调阶段发展为中级协调阶段(图2)。耦合协调度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阶段:1996—2008年处于失调阶段,2009—2015年处于协调阶段。两大系统在2008年之前存在微弱的相互作用,协调程度相对较低(图2),且长时间经历了低度失调期,其中1997—1998年为低度失调阶段,经历了两年的中度失调后,又经历了长达5年的低度失调阶段(2001—2005年),说明两大系统在趋向高度耦合的过程中经历了缓慢而艰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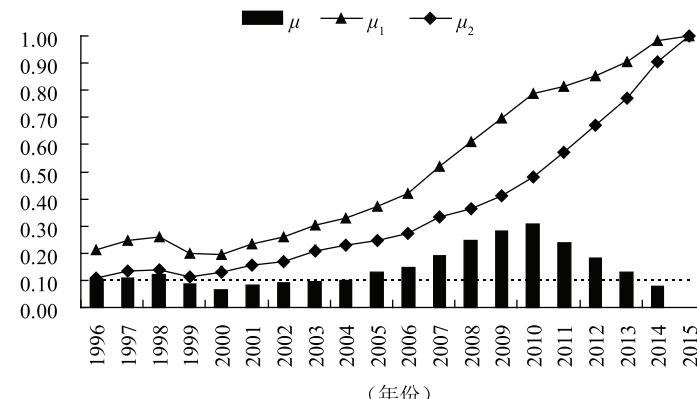


图1 1996—2015年南疆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评价指数的变化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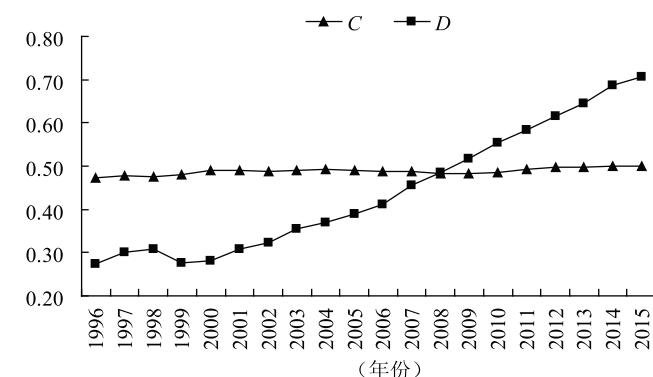


图2 1996—2015年南疆农业发展与农民收入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的变化趋势

阵痛过程。与耦合度的整体变化趋势一致，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在 2008 年后发生转折，说明南疆农业综合发展能力逐步增强，扶贫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直到 2015 年两者的耦合协调类型才开始步入中级协调阶段，距离高级协调还有一定距离，要实现良好协调的目标还需要通过更多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

不同发展阶段的农业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耦合关系不同。在一定时期内，加快农业发展可以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反过来，农民收入也可提高农业发展速度。但当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均达到一定水平时，农业发展水平的提高不再成为提升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也不会过多地影响农业发展。农业发展与农民收入在动态耦合关系中会产生明显的脱钩趋势，农民收入平均水平较高的地州会降低对农业发展的依赖，而农民更多的收入来自非农领域的贡献，并导致农业收入在农民家庭收入中的比重将进一步降低。

2.3 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异特征

耦合度方面，1996 年南疆 5 地州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之间的耦合度均处于拮抗阶段，强弱排序分别为巴州、克州、阿克苏、喀什、和田，而和田耦合度最低。由图 3 容易看出，1996 年南疆 5 个地州耦合度的分异特征表现得较为明显。2015 年南疆 5 地州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之间的耦合度发生了显著变化，5 个地州的耦合度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均接近磨合阶段的边缘。其中，克州、阿克苏、喀什的耦合度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与巴州相当；而和田耦合度提升最大，但仍处于最低位置。由图 3 容易看出，2015 年南疆 5 个地州耦合度的分异特征逐渐不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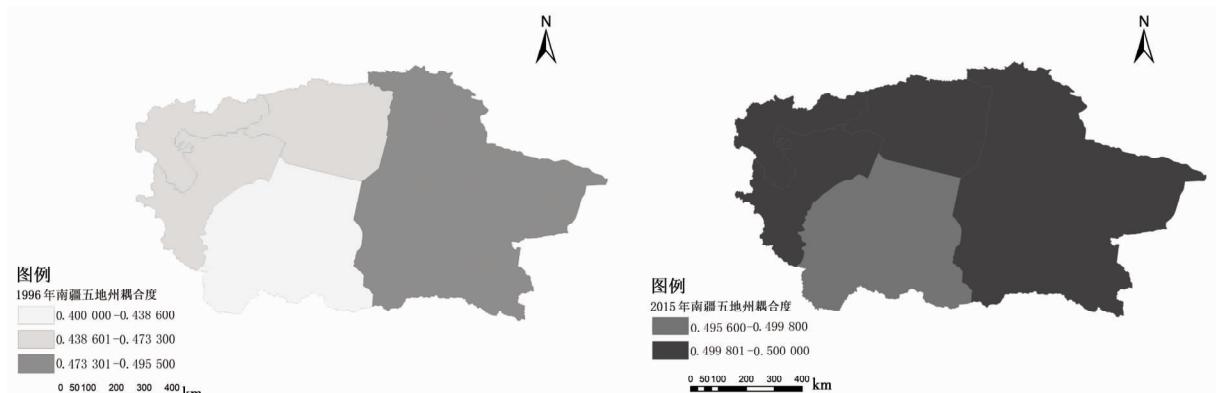


图 3 1996—2015 年南疆 5 地州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之间耦合度演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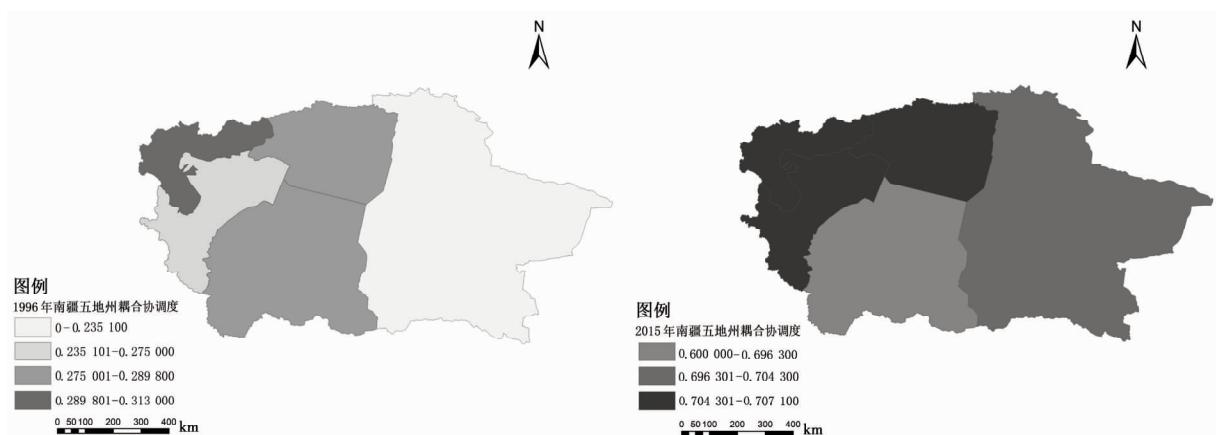


图 4 1996—2015 年南疆 5 地州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之间耦合协调度演化示意

耦合协调度方面,1996年南疆5地州耦合协调度降序排列为克州、和田、阿克苏、喀什、巴州。其中,克州处于轻度失调阶段,其他地州均处于不同程度的中度失调阶段。由图4容易看出,1996年南疆5个地州耦合协调度的分异特征表现得十分明显。随着时代变迁,2015年南疆5地州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之间耦合协调度发生显著变化,其强弱排序演变为阿克苏、克州、喀什、巴州、和田,其中,前4个地州均处于不同程度的中级协调阶段,和田处于初级协调阶段,而巴州提升最大。5个地州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出相近的趋势,分异特征相对不明显。其原因在于,1996—2015年南疆大力发展林果产业和棉花产业,造成南疆各地州农业产业结构单一、趋同化严重,导致5个地州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出相近的趋势,致使其分异特征由1996年的显著状态演化为2015年的不显著状态。

综上分析,无论是5个地州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之间的耦合度还是耦合协调度,在地区间禀赋条件、农业发展水平差异等因素作用下,在20年均发生了显著的空间分异现象。其中,无论是南疆还是各地州,其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之间的耦合度在20年内始终处于拮抗状态,位置较为尴尬,如何摆脱拮抗“魔咒”、实现向上突破、进入良性耦合阶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在于农业生产力水平落后、产业结构单一,对农民收入的带动作用较小,而农民收入增长乏力、来源渠道单一反过来也制约农业发展水平的提升。正是这种非良性循环年复一年,造成其耦合度在20年内始终处于拮抗状况。不难看出,南疆5地州的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之间的耦合度始终徘徊在拮抗阶段,但其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显著增长态势,由失调阶段进入协调阶段。这种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不均衡演进状态进一步表明南疆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空间潜力。

3 结论与建议

3.1 主要结论

该文利用耦合协调模型,深入探讨南疆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之间的耦合协调性,并对各地州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对比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

(1)“九五”时期以来,南疆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之间相互带动作用不够明显、发展不够平衡,使得两者间存在着不完全耦合的关系;由于各地州的产业结构趋同,两者间的耦合度始终处于拮抗阶段,但整体上呈现出缓慢增长态势。

(2)南疆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有了较大程度改善,已由“九五”期初的中度失调发展成为“十二五”期末的中级协调。

(3)南疆各地州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之间的耦合性和耦合协调性存在一定差异,但整体上呈现趋同状态。

3.2 对策建议

农业发展是农民增收的基础条件,农民增收是实现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和促进农业产业发展的基础动力,两者间高级协调是实现南疆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南疆居民人力资本水平偏低、未能得到有效开发的资源禀赋、农业产业基础薄弱、各地州产业结构趋同阻碍了南疆农业和农民收入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该文以“农民能力建设”和“农业产业布局优化”为切入点,提出如下建议。

(1)加强新型职业农民能力建设。南疆居民文化程度偏低、就业能力偏弱,因此推进南疆农民增收的关键问题在于人,核心问题在于人的能力建设。把农民组织起来,提升农民的素质与技能尤其重要与迫切。一是加强农牧民能力建设。依托“访惠聚”驻村工作体系,建立农牧民能力发展长效机制,设置人才培育专项计划加强人力资本教育,提升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加强“短平快”职业技能教育,建立速效的能力培养机制,提升农牧民整合资源、应用技术、利用信息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改变农牧民的思想贫困、智力贫困与技能贫困的状况。二是加强村级管理骨干、青年科技骨干培养。推进农村青年科技人才培养专项工程,出台激励保障措施,选拔农村能人、致富能手、返乡毕业生、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开展专项培训计划,发挥带头人对农民的辐射带动作用。

(2) 推进农业产业差异化与品质化布局。南疆农业资源丰富,但各地州农业产业基础薄弱、农产品附加值低、产业结构差异不够明显,因此以“差异化”与“品质化”布局推动南疆各地州农业产业发展。一是加强特色林果、园艺等产品区域结构的差异化布局。重点加强特色农产品品质区划工作,根据各地区自然条件、气候资源与农业种质资源的独特性,培育地域主栽品种,打造各区域林果、园艺等特色产品的差异化发展模式,实施“一地一品”工程,打造“一县一品”、“一乡一品”或“一村一品”模式,突显农产品的地域化、个性化、特色化等特征。二是实施特色林果、园艺业“优品提质”结构调整战略。建议设立南疆特色农产品品质提升科研专项基金项目,加大林果、园艺种质资源的引进力度,并选择大宗特色农产品作为重点研发对象,重点研发工程放在生物技术应用、丰产栽培、农业节水、农产品质量安全、功能农产品生产等方面,着力培育“单品之星”或“单品冠军”。

参考文献

- [1] 付大学. 城乡“剪刀差”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与财税法规制.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8 (1): 49–57, 130.
- [2] 郭天宝, 周亚成.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农业结构优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当代经济研究, 2017 (9): 80–87.
- [3] 赵晓锋, 张永辉, 霍学喜. 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2 (5): 127–133, 144.
- [4] 闫磊, 刘震, 朱文. 农业产业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 农村经济, 2016 (2): 72–76.
- [5] 张良, 韦开蕾, 许能锐, 等. 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与 FDI 能否促进我国农民收入——基于地区差异视角的面板数据. 当代经济科学, 2016, 38 (2): 61–68, 126.
- [6] 周稳海, 赵桂玲, 尹成远. 农业保险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动态研究——基于面板系统 GMM 模型的实证检验. 保险研究, 2014 (5): 21–30.
- [7] 宋莉莉, 马晓春, 王秀东. 我国农业发展方式对农民收入影响分析——基于 DEA-Tobit 模型. 中国农业科技导报, 2014, 16 (6): 149–158.
- [8] 周振, 张琛, 彭超, 等. 农业机械化与农民收入: 来自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的证据. 中国农村经济, 2016 (2): 68–82.
- [9] 陆文聪, 余新平. 中国农业科技进步与农民收入增长.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43 (4): 5–16.
- [10] 刘玉, 潘瑜春, 唐林楠. 京津冀地区县域农业发展与农民收入的时空耦合特征. 经济地理, 2017, 37 (2): 141–147.
- [11] 丁敬磊, 刘光远, 赵美平. 农地流转、劳动力转移及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研究——基于城乡统筹发展的视角.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6, 37 (2): 37–44.
- [12] 王中雨. 休闲农业中旅游业与农业耦合发展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7, 38 (4): 232–236.
- [13] 田双清, 陈磊, 谢皖东, 等. 川西高原农牧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量化研究.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7, 38 (4): 126–134.
- [14] 康蕾, 马丽, 刘毅. 中国城镇化与耕地变化时空耦合研究.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7, 36 (5): 87–92.
- [15] 赵向豪, 陈彤, 谢文宝, 等. 功能农业与新疆精准扶贫: 内在逻辑、作用机制与政策建议.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45 (6): 1–7.
- [16] 赵向豪, 陈彤, 姚娟. 新疆种植业地理集聚的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6, 35 (2): 153–158.

STUDY ON SPATIOTEMPORAL COUPLING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FARMERS' INCOME IN FRONTIER ETHNIC REGIONS OF NORTHWEST CHINA *

—TAKING SOUTHERN XINJIANG AS AN EXAMPLE

Zhao Xianghao^{1*}, Chen Tong², Lu Bingbing¹

(1. School of Economics & Business, Xinji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0052, China;

2. Xinjia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Urumqi, Xinjiang 830091,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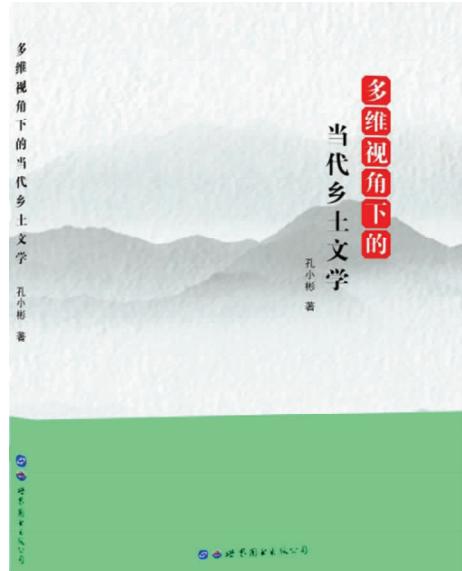
Abstract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condition for realizing the growth of farmers' income which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region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o reveal the function and the regular between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farmers' income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agriculture and rural economy. In this study,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teraction and the degre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farmers' income from 1996

to 2015 in Southern Xinjiang.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in terms of time evolution, the income growth of farmers lagged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for a long time in Southern Xinjiang, and their coupling degree had been in a state of antagonism.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farmers' income had significantly changed from the moderate imbalance stag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9th Five-year Plan to the intermediate coordination stage at the end of the 12th Five-year Plan. In general, it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rising fluctuation-slow rising-fast ris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due to the increasing industrial homogeneity, the change of the degree of regional coupling was converging in different prefecture. The mutual drive betwee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farmers' income in Southern Xinjiang is not obvious enough and the development is not balanced enough. Therefore,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Southern Xinjiang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farmers' income can be realized through strengthening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capacity and promoting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quality distribution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Keyword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farmers' income; spatiotemporal coupling; frontier ethnic regions of Northwest China; Southern Xinjiang

· 书评 ·

当代乡土文学的类型研究 ——评《多维视角下的当代乡土文学》



我国最早提出乡土文学概念的是鲁迅先生，他开启了乡土写实与乡土抒情两种题材小说的源头。乡土文学追忆作家的童年及故乡生活，叙述更多的是乡愁。乡土文学代表了一个时代，它伴随着社会的变化与作家创作实践的变化而产生。最初乡土文学的作者并不是扎根在乡土的作家，而是从乡下流寓到北京、上海等都市，受到城市现代生活与现代文明洗礼的青年人。正因为他们远离了家乡，渐生了牵挂与思念，才有了创作动力。他们在作品中对

家乡生活的描写是一种纯朴、率真、真切的乡土之思，他们的作品往往描写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呈现不同地域的自然景观学、人文社会学、民俗学研究。九江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孔小彬的著作《多维视角下的当代乡土文学》，正是基于当代乡土文学的不同类型展开的。

《多维视角下的当代乡土文学》一书，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于2018年3月出版。全书主要从传统与现代、现实与历史、政治及有关理论、媒介与文化等4个方面展开，深入分析乡土文学的得与失，认真梳理当代乡土文学的多样面貌。共4个章节，第1章介绍当代乡土文学的叙事艺术，包括文化隐喻的现代性解读、背靠传统的现代文体写作，以及文言白话“体”“用”之间的关系等内容。第2章叙述当代乡土文学的历史与现实，梳理乡土文学叙事的时间维度。包括乡土变革中的伦理问题，乡村政治的现实与寓言，乡土小说与中国想象，乡土现实的艺术超越等内容。第3章围绕城市与乡村阐述近现代乡土文学的空间转移，包括新世纪打工小说中的农民工心态表述，农民工小说的城市形象，文学期刊与打工文学的分化，乡下人进城与城里人下乡，乡土叙事的地域空间等内容。第4章透

(下转第198页)